

论后印刷时代话语中图像与文字的关系

叶起昌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当代图像与文字的关系体现为“超媒体”和“互动电视网络系统”两种形式。传统符号学以语言为本体论基础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认识论上是误导,符号的本质也被还原为符号现象。图像与文字,由于各自的不同“给予”,具有不同的认识论要求。认知的中介本质、符号的非中立性以及符号体系必须拥有的三大元功能不仅为区别图像与文字奠定了认识论基础,而且也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同时,更是理解虚拟现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图像; 文字; 后印刷时代; 话语; 给予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106(2005)04-0061-05

On the Image-Word Relation in the Post-Typographic Discourse

YE Qi-c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Hypermedia” and “the interactive television system” are the two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age and word. Epistemologically misleading is the traditional semiotic account of the image-word relation since it is ontologically based on language, and as a result, the nature of sign is reduced to its phenomena. Image and word possess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commitments due to their own separate “affordances”. The article holds that it is the mediated nature of human knowledge, the unneutral nature of signs, and the three metafunctions which any semiotic system should possess, that serve as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for the division of image and word,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semiotic systems and open an effective way to deal with the virtual reality.

Key words: image; word; the Post-Topographic era; discourse; affordances

一、前言

柏拉图的富有歧义的“洞穴之喻”(simile of the cave)常是讨论图像与文字关系的起点。该比喻将可视世界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由图像、影子和映像构成的部分,该部分仅是另一部分的模仿。另一部分则包括动物、生长的万物以及人工制品等。柏拉图进而指出,人们正是通过对第一部分的感知从而理解可视世界。强调图像的语境为下述观点的产生提供了充裕的条件:图像比文字更真实地表达世界,完美的语言

必然是以图像而不是以语词为基础,因为“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它可以“更直接与心灵对话”。文艺复兴时期线性视角的开发以及后来照相的发明无疑强化了上述观点。通过线性视角,艺术家就像观察者透过一扇窗户来看真实情景那样,来描绘世界;而照相则可以“自动”记录当时的情景,无须再阐释。

随后图像与文字的关系,特别是自达芬奇认为绘画高于诗歌以来,就一直处在争论之中。这种争论决非单单是学科或专业之争,因为图像与文字体现的不仅是重新界定视觉和文字艺术之间关系的必

收稿日期: 2005-05-27

基金项目: 北京交通大学人才基金资助项目(RWJ04025)

作者简介: 叶起昌(1958—),男,福建屏南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要性,而是我们体验表征、表达和使用符号方面最基本的分界线,同时,还是看与说、展示与谈论、显示与叙事之间的分野。

在后印刷时代^①语境下,语篇历来就是多语式^②的道理不仅成为共识,而且有关图像与文字关系的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特别是在计算机中介的交流模式(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中,这两者的关系无疑构成理解当代多语式语篇重要的认识论前提。我们的问题是,(A)传统符号学为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奠定了什么基础?(B)如何阐释当代话语中图像与文字的关系?(C)后印刷时代文本得服从空间排列规则?又是什么决定各种成分的空间排列?这三方面的探讨构成本文阐释后印刷时代话语中图像与文字关系的基本框架。

二、来自传统符号学的观点

西方传统符号学有两大分支。一是索绪尔构想的符号学;二是美国实用主义者 Peirce 开创的普遍符号学。这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前者上。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概念”与“声音—图像”结合而成的。他把语言符号定义为由概念与声音—图像两部分构成的“心理实体”。他说:“语言符号不是事物与名称的组合,而是由概念与声音—图像构成。后者不是物质声音,不是纯物理事物,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迹,也就是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印象。声音—图像是感官的,如果我碰巧称它为‘物质的’,也仅仅是在感官的意义上,并且‘声音—图像’是通过联想与另一个更抽象的术语‘概念’相对立”^[1]。于是,他用术语“符号”来代表整体,分别用“所指”来替代“概念”,用“能指”来替代“声音—图像”。据索绪尔的观点,“所指”与“能指”两个术语的好处在于它们既可以表示出把它们相互分开的那种对立,又能表示出它们与整体的关系。

“树”的图像(见图1)在图中并不起什么作用,仅占据理想实体的一席之地。但在索绪尔的构思中,文字与图像的差异不再只是媒介或艺术种类在

名义上的不同,而是一条语言表达和视觉表征两者内在的分界线,甚至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心理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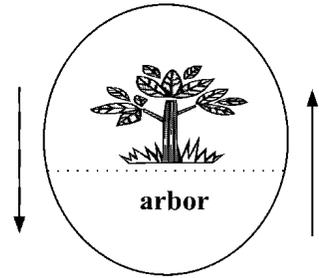


图1 (Saussure 1966: 67^[1])

于是,图1不妨这样解读:将图像“树”与词(arbor)分开的虚线既不是词也不是图像,而是示意这两者关系的概念空间。该示意线,正像图像两侧的上下箭头的作用一样,表达结构自身内部的意义循环或是“整体概念”。我们注意到,整个图1意味着文字与图像复杂地相关联,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仅是虚线而已。但不容置疑的是,不管是文字还是图像都不能单独构成符号整体。索绪尔已十分明确地表示出:图像仅是语言符号整体的一部分。

认为图像依赖文字的观点常以下述两点常识作为证据:一是从图像相邻的文字的作用来表明图像得依赖文字;二是分析图像的过程必须求助语言。

正是基于以上证据,同时又作为索绪尔理论的忠实实践者,罗兰·巴特不赞成图像具有符号自律性。他问到,图像知觉的自律符号学可能吗?换种问法,图像的符号学分析难道不要求助于语言模式?当然,这里的符号学指各个自成封闭体系的符号系统。以他的回答,阐释图像(以及其他任何符号体系)只能借助语言,别无他途。他写到:“图像可以表达意义,但从来就不是自律的;任何符号体系均含语言混合物。只要视觉物存在,意义就必然是通过语言来复制从而得到证实”^[2]。他认为图像与文字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本体论上的)“基础”关系(anchorage)和信息“传递”(relay)关系。在第一种关系中,图像依赖文字;而在“传递”关系中,文字与图像

①后印刷时代(the Post-Typographic era)泛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的这段时期。在这期间,语篇更多地应用电子媒介或多媒体传输,从而摆脱印刷形式,走上显示方式。(详见:Reinking, David; Michael C. McKenna; Linda D. Labbo and Ronald D. Kieffer (eds.) Handbook of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s in a Post-Typographic World [C]. Mahwah, NJ./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8.)

②多语式(multimodality)指同一语篇中多种语式并用,是近年来在话语分析领域兴起的跨学科研究,目的在于寻求一种综合的理解方式。语式(mode)指交流所采用的信道,不仅指口头和笔头媒介之间的选择,还有许多细节性选择。多语式并不是新现象。因为语篇从最早开始,就不是单语式。例如语篇以笔语为媒介,选择什么书写材料(纸张,石头,树皮,丝绸等),什么字体,什么颜色(红色还是黑色)等就构成了上述的“细节性选择”,这些选择同样也参与语篇的意义形成。这些细节性选择,在当代话语中,不但不是“细节性”,而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了。(详见: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1978; Kress Gunther & Theo van Leeuwen.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2001)

的关系是互补的。不管是哪一者,文字不是得到图像的延伸,就是图像从文字中拥有本体论基础。

对巴特以及后续的研究,Nöth^[3]做了粗略的归纳,并将图像与文字的关系概括为五种类型:

(1)图解关系(Illustration):图像—文字关系以图像必须依附它所要图解的文字为典型特征。

(2)图像示范关系(Pictorial exemplification):这种关系可看作是上述“传递”关系的次类型。与图解关系相比,图像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较大的信息自律性。比如百科全书中稀有物种的图像与该物种的文字说明就属这种关系。

(3)标记关系(Labeling):文字标示图像。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巴特的上述两种关系的概括,所以,也就有两种情况:基础关系(如画廊中图像的标题)或传递作用(如照片或图像下方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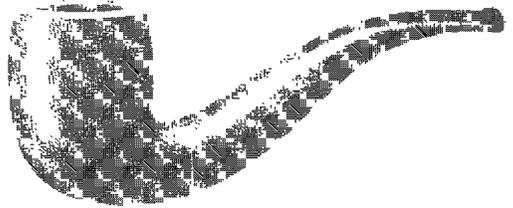
(4)相互决定关系(Mutual determination):这种关系是“基础”与“传递”关系的复合形式。文字指导图像的阐释,但图像对理解文字也起到相同的作用。常见的例子就是广告。其中,文字起到提问作用,而产品图像则发挥回答问题的功能。

(5)矛盾关系(Contradiction):图像与文字相互矛盾(如图2)。

不难发现,上述五种分类中的(1)~(4)都是以巴特的思维框架来说明两者关系的,惟独不同的是(5)。(5)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由于类似Magritte的“图像的背叛”这种图片(见图2)。而Nöth则认为(5)的情况极少,所以他在介绍和阐释时,也就不可能注意到(5)揭示的恰恰是文字与图像所共同拥有的东西。因此,笔者认为,(5)给研究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启发,包括:

第一,(5)揭示了人们认识(感知)世界永远是间接的和中介化的;第二,这两种符号体系的“给予”不同,也就是说两者表现世界的方式各异,并不是一者依附另一者;第三,这种关系促使我们要在上述四种关系的更高层次来重新思考图像与文字的关系;第四,如果把认知过程看作由像似符号(icon)、标示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三个阶段组成,那么,(5)说明该过程并不是超越或排斥图像与标示阶段,从而达到象征层次,而是这三个阶段的整合;第五,这种关系还揭示了任何图像与文字都可按“这不是……,而是……”的方式解读。这意味着任何符号

体系必须拥有指向外部世界的功能,也就是具备Eco所认为的“撒谎”本质(见“结语”部分)。上述几个方面将在随后的论述中进一步阐释。



“Ceci n'est pas une pipe” (“这不是烟斗。”)

图2 “图像的背叛”

(Rene Magritte, 1929, 转引自: Durham, 1998: 28^[4])

三、后印刷时代话语中的图像与文字关系

上述传统符号学奠定的基础对探讨当代话语中的图像与文字的关系起着什么作用?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基础提供了一个研究该问题的平台。显然,不管是“说明”(图像说明文字语篇),还是“阐释”(如文字阐释图像),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能充分解释图像与文字的复杂关系。实际上,在话语领域,图像可以不依赖它们所伴随的文字,如展览会的目录,正像许多当代画报一样^[5],其中的图像就可设计成是自足的,或是设计成可插入不同的上下文语境的文本。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索绪尔和巴特是以什么为基础来区分图像与文字的?他们都回答说是“(口头)语言”。倘若图像与文字仅是待区别的对象,从本体论上说,它们中的任何一者均不能充当这种区分的基础。显然,以口语作为图像与文字的分水岭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同时还掩盖了符号的本质。这也正是德里达毕生予以“解构”的“言语中心论”(logocentrism^①)。而福柯的下述看法更为接近当代观点又与阐释图2有直接的关联。

福柯认为:“语言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是无穷的。这并不是说,文字有缺陷,也不是说当际遇可视物时,文字特别显得无能为力;而是说,语言与绘画不可相互削减:我们想用文字来表达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徒劳,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永远不存在于我们所

①“语言中心论”是德里达用来描述口头语言在索绪尔语言学中的显著地位。德里达指出,索绪尔把“逻各斯”(logos)等同于“声音”(phon [sound])也就强化了这样的信念:口语是思想的表达,思想可以独立于语言而存在。德里达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详见: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M]. tran.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说的之中”^[6]。与上述索绪尔和巴特的观点相比,这段话至少表达了下面几层意思。其一,图像与文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从文字起源的角度来说,绘画恰恰是文字的先驱,几大古文字体系的考古学早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其二,从文字的角度来理解图像或是从图像的角度来理解文字都是不可取的,更不能用一者来衡量另一者。也就是说,它们服从不同的规则。我们也可以通过解读图2来理解福柯的想法。图2可包含下述意思:“这不是烟斗,而是烟斗的图片”;“这不是烟斗,仅仅是表明‘这是烟斗’的一个句子”;“这张图片、这个句子、这张烟斗的图像,这三者都不是烟斗”。总之,它不是烟斗,甚至不是烟斗的表征,或仅是烟斗图像的多次复制后的假象(simulacrum)而已。这种从一个阐释走向另一个阐释无限的解释过程恰到好处地指向符号自身的本质。在这方面,Peirce的“符号化过程”(semiosis^①)概念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参阅“注释”部分)。这一点这里不再展开。

文字学家唐兰曾指出:“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7]。这里,唐兰不仅说明了图画和文字的先后以及它们之间在他看来的那种简单关系,而且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大胆设想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这种设想,在这个后印刷时代,已经成为现实。

促成这种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篇视觉化的发展则是不可或缺的。而语篇视觉化又依赖电脑语言的两次变革。其一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用ASCII编译字母和数字,计算机由此变成了理想的信息处理机。其二,随后的图像信息的数据化和二分法化标志着计算机打开了一个图像的王国,电脑可完全当作超媒体(hypermedia),可以对图像进行操作是目前各种网络与虚拟技术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Kress认为后印刷时代是显示的世界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电子文本的体现方式,哪怕是语篇中的文字模块,均为屏幕显

示,因而书写也得服从图像逻辑,空间排列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当代话语的主导模式。并且图像与文字的关系问题,从技术层次上说,已经不再是问题,不存在一者依附另一者或相互依赖,因为两者都可转换成电脑语言,不存在差别。

在CMC中,图像与文字又是什么关系?在这种背景下的图像与文字关系显得更加易变、复杂并具普遍性。在数字语篇中,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数字图像与文字语篇是合作关系。这只要通过察看网页就可明白。图像当然可像传统印刷那样,设计在中央位置,环绕或相邻以文字,从而起着巴特提到的上述各种作用。然而,在网页上,整张图像,或是图像的某几个部分同样起着本体论基础的作用,从而链接到其他网页。比如一部艺术作品的简略图可以链接到存贮着更为详细图像的单独文件夹。在这种情况下,图像,正像基础词或短语一样^[8],起着超文本链接的作用。

另一种可能性在于,图像并不与文字有着超文本的指称关系,而是置换了超链接或线性书写,意即不必间接地与其他图像或文字联系,而直接用图像交流。正是这种可能性使得不少学者预示着因特网必将发展成为“互动的电视网络系统”(the interactive television system)。网络视频聊天、网络会议以及网络会诊等均可看作是这方面的部分实例。

总之,电子语篇为图像与文字的关系提供了两种可能性:超媒体和互动电视网络系统。这里,我们需要清楚的是,由于电子媒体的复杂特征,问题也就不是图像或文字哪一者完全优于另一者的问题,而是,既然图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否图像也能起到文字一样的作用?或是,语篇中哪个位置设计为图像,而其他位置使用文字?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莫过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交流目的以及不同的语式功能,决定图像与文字在语篇中的比例以及它们的空间排列。

四、社会符号学的分析框架

社会符号学寻求图像与文字的综合理解方式,从而为各种交流模式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手段。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来看,任何符号体系,不管是图像还是文字、是印刷语篇还是电子语篇,都要满足下述三

①符号化过程(semiosis)指一个不可简约的三者过程,包含:(1)符号;(2)符号客体;(3)符号实际的或可能的符解。对这三者,皮尔士(CP2, 228)是这样界定的:“符号,或者说代表项,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对某人而言代表某物。符号与人交往,也即是说,它在那个人的头脑里引发一个相应的符号,或者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我把这个后产生的符号称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符号代表某物,即它的对象。它不是在所有方面,而是通过指称某种观念来代表那个对象的。我有时称这种观念为表象的基础”。符解成为符号以及这符号又成为符解的事实将符号置于一个符解的开放网络;这就是皮尔士的无限的符号化过程或无尽的符解序列原则。(详见:叶起昌,符号化过程与阅读空间[A].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编,《语言学研究》第二辑[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24.)

个条件⁹⁾:

1. 必须具备“概念元功能”(the ideational meta-function),也就是在指称或假指称的意义上符号体系要表征体系之外经验世界的方方面面。

2. 必须具备“人际元功能”(the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也就是要形象化或具体化地体现符号生产者、被表现的客体以及符号接收者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3. 必须具备“语篇元功能”(the textual meta-function),也就是任何符号体系都应该有形成语篇或符号复合体的功能,并且形成的语篇要有内在连贯性,又得与外部语境相关联。

这三个条件正是符号化过程(semiosis)的具体化和补充,它们发生在理解任何符号体系的过程中,同时,也是研究图像与文字关系的前提条件。

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谈得上图像与文字具有不同的“给予”,因而两者突出事物的方式不同,也就有不同的认识论要求。

“给予”,据 Gibson^[10]生态知觉论,是环境提供给特定动物的环境现象。Gibson认为,知觉并不是传统理论所描述的,动物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材料,而后以早于知觉的“联想”为基础对其加工表征,这种表征又反过来充当随后表征的范式。Gibson指出,知觉是动物在积极探索自身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他强调的是动物能辨别出与自身物种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信息。动物在生存环境中既是接受者也是行为者,动物环境不可以,也不可能理解为或削减为物理环境。对环境有关事件的知觉不仅为动物提供这些事件的信息,同时也给予了动物如何行为与表现的能力。在信息的层次上而言,动物的生存环境同样也受到限制,不同物种适应环境的不同给予。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动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动物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一方不能摆脱另一方而存在。换句话说,环境对物种而言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注意与我们这个物种无关的所有信息。但Gibson对知觉的论述似乎是在前符号学的层次,需要进一步细化。

上文提到,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在技术层面现在已没有差别。但技术层面的无差别并不意味着实际使用中的相同,文字不是图像,图像也毕竟不是文字。对这种区别,社会符号学正是沿用上述“给予”概念来阐释各种语式自身在交流和表征方面所拥有的可能性和制约^[11]。比如用文字表达桌子与桌腿的结构关系,我们就得用某个词,我们可能会说:“每

张桌子都有桌腿”;倘若用图像来说明这种关系,我们会画出一个平面来表示桌面并在平面下画上桌腿。这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要求:命名关系和空间定位。这种认识论上的不同要求,索绪尔和巴特没有也不可能注意到,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字是所有其他符号体系的基础,在认识论上也就不存在这种不同;福柯意识到了两者的差异,因为“两者不能相互削减”,但没有提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如何解决。

社会符号学则认为图像与文字在语式层面不可能没有区别,文字表现的是叙事世界;而图像展现的却是显示世界。但在更大范围的符号世界里,它们却拥有相同的本质。

至此,本文粗线条地回答了“前言”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似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有待解答,那就是,人们为什么不是直接而只能是间接地知道客观世界?答案的一个方面只能从符号自身的本质中寻找。

五、结 语

符号拥有什么本质?实际上,Nöth提到的图像与文字关系的第五种类型已经暗示出符号的本质。矛盾关系可以理解为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张力。如果我们把话语定义为社会实践的符号层面,那它也就是各种张力(各种意义)的交往场所。如何从符号学的层面来阐释这种张力,Eco作了如下表述:

“符号学涉及任何可以充当符号的事物。符号也就是用以替代其他东西的任何事物。在提到被替代的东西时,它没必要是存在的或必须在某个地方。于是符号学原则上是研究可用以撒谎的任何事物的学科。如果事物不能用以撒谎,也就不能用来诉说实情,事实上,它也就不可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12]。于是,他认为,“撒谎”理论就是普通符号学的总的原则。也就是说,能否用来“撒谎”是衡量事物是否具有符号本质的关键证据。毫无疑问,不管是图像还是文字均拥有这种本质,尽管在后印刷时代信息的传输方式变了,但符号的本质如故。换句话说,图像、文字以及其他符号体系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特定视角(或叫做意识形态),也就只能表现现实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不能中立地表现世界,仅是中介化了的表征。这是研究图像与文字关系的认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种基础,连同第四小节谈到的三个元功能,构成了阐释图像与文字关系的总体框架,同时,更是理解虚拟现实的有效手段。

(下转第80页)

用,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实现各种物流环节的合理衔接,并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目标外,还包括实现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量的最小化,以保证我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于单向物流系统存在缺陷,过度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的影响,所以研究循环物流系统理论具有极大的必要性。

高中(联合国项目专家、国际水协高级顾问,清水同盟主席、教授)认为,应尽快理顺、整合、改革中国水务行政管理体制。中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的供给将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他提出了6个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①成立国家水务管理委员会。②成立具有相当权力的流域管理委员会。③建立垂直管理的水环境管理体制。④撤销水利部成立水务部。⑤建立地方政府主导的水务管理模式。⑥保持现有机构不变,实现有效协调和制衡。

胡联国(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博士提出,正确处理基础产业自由化与民营化关系的5个要点:①市场自由化应该在民营化之前。②鼓励网络基础设施共用。网络有很好的外部性,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共同使用。③确保下游零售市场之公平竞争。④政府补助应与市场竞争分离。⑤建立与执行新竞争规则。

史立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和管理研究所)博士认为,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解决增量扩张。中国基础产业设施的改革与西方是有差别的,我国主要是解决供给不足,弥补资金,解决增量扩张的问题。在体制上,过去的基础设施产业都是集中管理体制,政企合一,在此起点上改革,从增量开始,由易到难,然后由外到里,一步一步深入。铁路改革的关键是要强调一个新的增量扩张机制。在重组问题上,抑制垄断的破坏力可能比打破垄断还重要。

(责任编辑:刘越)

(上接第65页)

参考文献:

- [1] de Saussure, Ferdinan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lbert Riedlinger; tra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ade Baskin. New York/Toronto/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55. 66.
- [2] Barthes, Roland. *Elements of Semiology*[M]. tran. by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4/1973. 10.
- [3] Nöth, Winfried. *Handbook of Semiotics*[M]. Bloomington/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454-455.
- [4] Durham Scott. *Phantom Communities: The Simulacrum and the Limits of Postmodernism*[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8.
- [5] Van Leeuwen, T. & Carey Jewitt (eds.) *Handbook of Visual Analysis*[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6-7.
- [6]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9.
- [7] 唐兰. *中国文字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49/2001. 55.
- [8] Bolter, David. *Hypertext and the Question of Visual Literacy*[A]. In David Reinking, Michael C. McKenna, Linda D. Labbo and Ronald D. Kieffer (eds.) *Handbook of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s in a Post-Typographic World*[C]. Mahwah, NJ. /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8. 3-13.
- [9] Kress, Gunther & Theo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40-1.
- [10] Gibson, James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9.
- [11] Kress, Gunther.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12] Eco, Umberto. *A Theory of Semiotic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7.

(责任编辑:刘越)